

第一章 与华北共存亡

红军——八路军

1937年7月8日夜，陕西三原县云阳镇红军营地一片静谧，战士沉沉入睡。在红军前敌总指挥部的油灯下，政委任弼时、总指挥彭德怀和政治部主任杨尚昆屏息收听着南京中央社广播的一个震动全国、关系整个民族命运的消息：日军7日晚10时在卢沟桥演习，演习后伪称有日兵一名失踪，无理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检，我方允以互派代表调查。忽然东门枪声大作，继而西门枪声继起。我方甚镇静，未曾还枪。最后万不得已，采取自卫手段……8日，日寇竟无理要求我方撤退卢沟桥宛平驻军。我二十九军（该地驻军）已举兵抗击，誓与城共存亡。

早在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指使其在中国东北的驻军于9月18日晚向驻守沈阳的中国军队发动进攻，由于蒋介石奉行不抵抗政策，遂使东北三省沦陷。其后日本占领热河，在华北制造事端，妄图吞并华北五省，进而奴役全中国。

卢沟桥的炮声来得既突兀也不突兀，日本帝国主义终于

在华北动武了。但这一次它没有得逞。在全国人民抗日怒潮的影响下，驻守卢沟桥的二十九军将士奋起抵抗，揭开了八年抗战的帷幕。

彭德怀取下耳机，站起身来，走到地图前，把一面小标旗插在卢沟桥的位置，眼睛闪动着光，严肃中透露出振奋。大家的目光投向地图上的同一点，仿佛听到了华北平原的隆隆炮声。

指挥部的几盏灯彻夜未灭。当晚，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大声疾呼：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全国同胞团结起来，驱逐日寇出中国，为保卫国土流尽最后一滴血！9日，彭德怀、贺龙、刘伯承、林彪、徐向前、叶剑英、左权、肖克、徐海东和全体红军将士通电南京政府，请缨杀敌。

中国工农红军，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军队：各式的装备——从西方的毛瑟枪、来福枪到中正式、汉阳造步枪、长枪，到大刀、长矛；杂色的军装——绿布的、灰布的、蓝布的、黄布的都有。但它拥有年青而又充满理想的士兵， $\frac{1}{3}$ 是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战士， $\frac{2}{3}$ 是在东征、西征中参加红军，刚刚摆脱了奴隶般命运的贫苦农民。它还拥有经过长期考验的各级指挥员，连长以上全是共产党员，能够识字；团长以上一般有8年以上的作战经验。经过长征，红军有了自己值得信赖的领袖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它的前敌总指挥彭德怀英勇善战，和士兵穿着一样的土布军衣，吃着一样的粗茶淡饭，在行军中总是把自己的坐骑让给伤病员，和战士一起用脚板走过了长征中的大部分路程……

这些情形，使当时深入苏区采访的美国记者斯诺惊叹不已，并向全世界作了报道。

富有传奇色彩的红军时代快要结束了，国民党和共产党正在重建统一战线，以便团结抗日。彭德怀和红军的指战员在这里时刻准备着投入一场伟大的民族战争。

西安事变前，国民党政府的飞机常常光临红军驻地上空，扔炸弹，撒传单，出 5 万到 10 万大洋的悬赏捉拿彭德怀。红军正缺乏纸张，彭德怀下令把这些传单收集起来，在它的背面印上红军的口号，发给战士和群众。国民党的悬赏成了红军的笑谈。彭德怀仍然在驻地各处随便行走，有时看战士操练，有时向群众征求意见。红军指战员之间和红军与群众之间的这种关系，过去是使蒋介石的政府军最害怕的事情；而以后，则将成为日本侵略者最头疼的问题。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的飞机不来骚扰了。红军在渭北的黄土塬上练武。彭德怀要求把刺杀、投弹、射击列为主要的项目，准备在未来的抗日战争中，充分发挥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特长来打击敌人。指战员满腔愤怒，把枪口、刺刀对准做成鬼子模型的靶子。

根据中共向国民党提出的、为实现联合抗日的四条保证中的第二条：“工农民主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政府与军事委员会的指导”，红军在 7 月下旬开始按国民革命军编组改编，兵力总计为 42000 人。

在协议过程中对八路军的指挥员的任命发生了问题。中共提名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而蒋介石只同意朱德为总指挥，不同意对彭德怀的任命，亦不同意八路军总部设副职。蒋介石没有说明理由，但可以看出，蒋介石不愿意给年过半百的红军领袖朱德配上一名强有力的助手；对这位驰骋

苏区所向披靡而在起义以前还只是湘军一名团长的彭德怀也不免心有顾忌。只是经过中共方面的坚持，蒋介石才同意下来。

7月22日，红军前总召开兵团以上干部会，彭德怀在会上作《红军改编的意义和今后工作的报告》。

红军即将进入民族战场，进入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治环境，即将和过去十年血战的阶级敌人共同抗日。在这个战略转变的关头，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呢？彭德怀回顾了红军十年艰苦斗争的历史，告诉大家，改编后的中心问题是保障党对红军的单一领导、绝对领导。没有党就没有红军，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他要求大家保持红军的特长和优良传统，做友军的模范。

红军迅速集中，指挥员热烈谈论着改编和出动问题。彭德怀繁忙之中，有时拍着年轻的红军干部肩头，笑道：“莫找老婆咯，要上前线打鬼子了！”

8月4日，在庐山和国民党谈判归来的周恩来、博古、林伯渠与红军总司令朱德奉洛甫、毛泽东的指示，风尘仆仆，赶到云阳和彭德怀、任弼时共同讨论红军出师的兵力问题。洛甫、毛泽东的意见是红军先出动 $\frac{1}{3}$ 的兵力。朱、周、林、博和彭德怀、任弼时讨论了一整天，报告洛、毛说：“我们再三考虑，认为仍以红军主力出去为妥。”毛泽东沉吟整夜，翌日，与洛甫原则上同意了朱、周、彭等关于红军开拔主力的意见。

从以后战局的迅速发展来看，这是一个有巨大历史意义的决定。

卢沟桥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一面派兵开赴华北，一面在庐山与中共代表就共同抗日的问题进行商谈，同时仍未放弃

对日妥协的幻想，与日寇进行一次又一次的谈判。日寇利用时间迅速调军，进入华北，7月29日侵占北平，30日攻陷天津。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上海守军英勇抗击。8月14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发表声明表示坚决抗战的意志：“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唯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自此，全中国进入伟大的民族抗战。

在陕西省洛川县城北 20 多里的地方，有一个名不载图籍的小村庄——冯家村。二三十户人家，世世代代依靠黄土为生，住的土窑，睡的土炕，在黄土地上耕耘和收获。从来想不到在他们的乡土上会发生什么使外界注目的事情。

1937 年 8 月 22 日到 25 日，中国共产党在这里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向全国民众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向全党提出的《关于目前形势及党的任务的决定》。会议还讨论确定了红军在抗日战争中的任务和作战方针。这个对坚持八年抗战起到重大指导作用的会议，使冯家村在历史上留下了永久的印记。今天，窑洞里的岁月仍凝止在当年——土炕、老式的黑漆方桌、白木条凳，一切如开会时的布置。人们络绎不绝地到这里来，涌进一排三孔、原为一所私塾课堂的窑洞里，追寻那次历史性会议的印迹。

当洛川会议召开的时候，日本进攻华北的兵力已达到 5 个师团、10 万人以上，国民党在华北战场上的兵力也达到 30 余个师、计 30 余万人。然而，传来的消息是良乡、房山、南口相继失守。根据敌强我弱的抗战形势，洛川会议提出了进行持久战的抗日战略，决定红军只留少数兵力驻守陕甘宁边区，主力 32000 人开赴晋绥前线，和国民党军共同支持华北。万一

国民党军队放弃黄河以北，红军仍然要拖住日寇，坚持华北抗战，挽救危亡。

以 3 万余红军而决心支撑华北，说起来，这是一个难以令人置信的要求。红军将如何去实现这个战略要求呢？

8 月 22 日晚，毛泽东坐在冯家村头那孔历史性窑洞内黑漆方桌的一边，操着一口浓重的湖南口音，从容道出他的深谋远虑：

“红军的作战地区在晋察冀之交，受阎锡山节制，红军的基本任务应当是：1. 创造根据地；2. 钳制与消灭敌人；3. 配合友军作战；4. 保存与扩大红军；5. 争取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权。”

关于红军的作战，毛泽东说：“应适用游击战与运动战，还有红、白军共同作战。”

毛泽东停顿片刻，然后进一步解释他的意思：红军要“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括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与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着重于山地”。

会桌周围坐着中共的著名领导人：会议的主持者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政治局委员博古、周恩来、朱德、张国焘、任弼时、彭德怀；还有贺龙、关向应、林彪、聂荣臻、罗荣桓、刘伯承、徐向前等。毛泽东关于红军的任务和作战方针的意见，引起了大家的讨论。

红军前敌总政治委员任弼时在发言中提出对红军作战原则的修改意见。他认为，红军应当“不失时机的在有利条件下集中力量消灭敌人”，这样“对增强我们的领导及扩大部队均有关系，所以还是独立自主的山地运动、游击战”。

彭德怀坐在老式方桌的另一侧。他即将身赴前线，正集中

思索着红军怎样以 3 万之众，在广阔的华北战场上打开局面，实现毛泽东提出的红军的基本任务。他补充毛泽东的意见说：“红军出去，基本的是打胜仗，树立声威，开展统一战线。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党与红军的地位，也可使资产阶级增加抗战的决心。”关于红军的战略问题，他说：“我基本上同意毛泽东的报告。在战术上要很谨慎，在胜利把握较多的时候，集中优势于敌人的力量来袭击敌人，用广泛的开展武装农民来掩护游击战争。”

接着，彭德怀对任弼时提出的游击战、运动战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一般说，运动战的可能减少了一些，但发动群众，麻痹敌人，调动敌人是可能的。游击战与运动战是密不可分的。”

会议进行到深夜，气氛严肃而热烈，畅所欲言。关于红军的作战原则，有了三种意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独立自主的游击运动战；独立自主的运动游击战。由于出师紧迫，这个问题在会议上没有进一步展开讨论。彭德怀后来回忆说，当时他对于运动战和游击战这两个概念，主次是模糊的，有时谈运动游击战，有时提游击运动战。毛泽东本人在 1937 年 10 月 25 日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也曾把游击战与运动战并提，他说：“现在八路军采用的战法我们名之为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和运动战。”

洛川会议以前，国共两党已就红军改编问题达成协议。1937 年 8 月 22 日，蒋介石以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委任朱德、彭德怀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副指挥（9 月 11 日改十八集团军总、副司令）。8 月 25 日，中共中央

军事委员会命令：依据与国民党谈判结果，宣布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改编为八路军总指挥部（9月13日改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简称总部或集总），以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八路军下辖一一五师、一二〇师、一二九师。一一五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一二〇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肖克；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准备开赴山西前线，加入第二战区（晋绥）序列。

同日，朱德、彭德怀向全国通电就职。

八路军的点将台上，是红军的领袖和红军三大主力的著名指挥员 朱德——中国工农红军的创始人和红军总司令；彭德怀——红一方面军第三军团的创始人，中国工农红军前敌总指挥；叶剑英——中国红军军委副总参谋长；左权——红一军团代理军团长；林彪——抗日红军大学校长兼政治委员；聂荣臻——红一军团政委；贺龙——红二方面军的创始人和总指挥；肖克——红三十一军军长；刘伯承——中国红军军委总参谋长；徐向前——红四方面军总指挥。

尽管蒋介石仍以重兵虎视着陕甘宁这块红军的后方基地，中国共产党把红军的主力 and 精英投入了抗日第一线。特别是举世闻名的红军总司令朱德，虽已年过五十，仍亲自率师出征，表现了共产党和全国军民共赴国难的决心，推动了国民政府所属各派系和地方军队在抗日目标下的统一。蒋介石及国民党党政要人于右任、程潜、刘峙、商震等和各省军政首脑阎锡山（山西）、何键（江西）、冯治安（河北）、刘湘（四川）、贺耀组（湖南）、陈果夫（江苏）、韩复榘（山东）、盛世才

(新疆)龙云(云南)等纷纷驰电致贺称红军“忠诚谋国，至为嘉慰”；“敌忾同仇，至佩壮烈”；“风声所播，遐迩同钦”……一封封登载在国民政府区和红军的报刊上，堆积在蒋介石和毛泽东的案头。

8月27日，洛川地区雷电交加，大雨滂沱。雨水冲刷着黄土，从塬顶向川谷奔泻直下。天地茫茫，行人绝迹。只有一辆军车无视狂风虐雨，在咸榆公路上奋驰。车轮不时陷在泥淖中打空转。这时，车上的人，便一个个跳下来，他们正是全国瞩目的八路军总、副司令和正副师长们。朱德争着抱石头，垫车轮；彭德怀挥动大锹，拿出少年修堤时的老把式铲泥；刘伯承在后面推车——雨打在眼镜片上，使他不能去搬石头。

几十年后，当日同车的傅钟回忆说，好一辆军车！中华人民共和国的6个元帅，曾经淋着大雨来推动它哩！

中午时分，在洛川南一个小镇打尖，彭德怀独自端坐在饭铺前，他的胃正在阵阵抽搐作痛，过草地时吃野菜中毒得下的胃病又犯了。关向应去叫他几次，彭德怀若无其事地摇摇头。关向应奇怪地问：“老彭，你莫非是神仙，只显神通不吃饭的？”确实，彭德怀的身体是一个奇迹，吃得很差，付出的精力过人，“吃的是草而挤出的是奶”；在枪林弹雨中出入了21年，他只受过一次轻微的擦伤。

从陕北高原到渭河平川，连绵大雨，没能阻止八路军出征，在华北横冲直撞的日寇，将要吃到它的第一个苦头了。

旗开得胜

1937年9月初，朱德总司令在三原举行红军誓师，彭德

怀陪同周恩来，并林彪、徐向前等一行人，于 5 日先抵太原，准备和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会商红军参战事宜。

这时，华北战场上日军的攻势，从平津作辐射状指向三个方面。一路沿平汉路向涿州，一路沿津浦路向沧州，主力则放在晋绥方面。日关东军派遣兵团在攻陷南口和张家口后，正沿平绥路扑向大同，日第五师团在占领蔚县后，向广灵方面疾趋内长城，企图由两翼合击太原，占领山西。

卢沟桥事变以来，日军在华北未遭到严重的打击，长驱直入，凶焰正炽，山西即将成为华北的西战场。

山西地属高原，是个易守难攻之地。从河北平原望山西省，如在桌底望桌沿，是连绵屏立的大山。在山西高原上看，远古的高台被风雨浸蚀，形成千崖万壑。凸起的，为几条大山脉：西北为管涔；西为吕梁；东北为恒山，五台；东部太行山自北至南，划开山西、河北二省，古称“天下之脊”；南面又以中条、王屋二山为山西、河南的天然界线。凹处成为河谷、盆地。黄河在西界，从北而南穿流晋陕峡谷，至潼关折而东流，成为捍卫陕甘和中原的天堑；滹沱河、漳河及其支流，出太行而入河北，冲刷出的沟谷，又成为山西高原和河北平原间的通道，称为陉，正太铁路就是取道号称太行八陉中最著名的井陉进入山西的。那些大大小小的盆地，则是大大小小的城镇所在。山西的北界为蜿蜒的长城，隔大漠遥望阴山（大青山），为山西与绥远的界线。古人称山西表里山河，长城各口、太行诸陉，险关林立，使山西在历史上既为兵家往来攻占之地，又是利于封建割据之所。从清朝以来，山西成为内地，关塞废弛，但凭天然形势，阎锡山仍能据以实行军阀统治，做山西的土皇帝。

日寇早就看到，占领了山西，就可免除山西对华北大平原居高临下的威慑之势，并使山西的丰富矿产和平原的粮食结合起来；就能安枕平津、坐踞华北。

毛泽东也正是以山西这一特殊地形与地位为依据，提出红军要以山地游击战为主的作战方针，在华北实行持久的抗战。

面对日军进攻的阎锡山——红军出师后的第一个和主要的合作者，是统治山西 20 多年的老军阀，他早年留学日本士官学校，与后来成为日本在华北特务头子的土肥原贤二、侵华日军第五师团长的坂垣征四郎等有交往。日本帝国主义势力入侵华北，阎锡山和土肥原密切往还，企求自保；但日军要搞华北五省自治，叫阎锡山当汉奸，他也不干。他想抗日，又幻想在可以接受的条件下和日本妥协。对南京政府方面，阎锡山从 1930 年在蒋、冯（玉祥）、阎中原大战失败后，不得不拥蒋；但他又害怕被蒋介石吃掉，连在山西修铁路都坚持采用窄轨，以防蒋介石军队破关而入。对共产党，阎原是个坚决的反共分子，1936 年红军渡河东征抗日，他重兵堵截，向蒋介石求援。其后，蒋介石军留在山西不走，日军步步紧逼，他又和中共联系，允许中共中央派彭雪枫在太原建立秘密办事处；邀请薄一波到山西，在他原有的晋绥军和公道团等组织外，帮他另建新军——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和组织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想利用共产党的经验来发展自己的势力。这样，在山西战场上，就有阎锡山的晋绥军，有蒋介石的中央军，有奉命调入山西的他省地方部队，有名义属阎锡山实为中共政治领导下的决死队，还有新入晋的八路军。阎锡山想在各种力量间纵横捭阖，“守土抗战”保持他经营多年的山西“王国”

在红军东征抗日和阎锡山守土抗战口号的影响下，山西的民众抗日运动在“七·七”事变前已开展起来。平津失陷后，中共华北党组织动员了大批党员和爱国学生到山西参加抗战，山西的救亡运动更形高涨，一时成为华北抗战的中心。彭德怀在其回忆录中曾谈到当年赴太原一路所见民众抗日情绪之高：“沿途人民夹道欢迎，送水送茶，拥塞于途，馒头烤饼，扔满车厢。”“……街谈巷议，无不希望红军早日参战。到太原时，人民盼望共产党和红军参战之心更切。”

在日军即将闯入山西之际，阎锡山把晋绥军部署于大同一带，准备与日军一战。红军出师，也准备首先开赴大同前线。但当周恩来、彭德怀等赶赴晋北时，守卫天镇（大同东北）的晋绥军当日军尚在数十里之外，就闻风而逃，阳高、天镇相继失陷，山西形势急转直下。阎锡山急请周恩来、彭德怀等返回，共商防守之计。

时近中秋，夜凉袭人，周恩来、彭德怀、徐向前从大同驱车，直抵雁门关下太和岭第二战区前线司令部。阎锡山全身戎装，在司令部门前迎候。

雁门关绝壁如门，相传为北雁南飞必经之处。长空雁叫，使本来就因天镇之溃盛怒未平的阎锡山，心神更加不宁。大同一失，雁北十县也将不守。就在前两日，他第一次会晤周恩来、彭德怀，曾吟诵过他的一首近作：“南口之役失权衡，准备毫无守何成，八万精兵损半数，致使雁绥枉经营。”这原是慨叹中央军刘汝明、汤恩伯之轻失南口，不料今日竟成了自讽。眼看日军长驱入晋，他战无信心，不战又无以回答山西民众。周恩来是他早已闻名的英才，彭德怀在红军东征时曾与他

兵戎相见，他知道，挽救晋局，必须借重红军之力。9月初，周恩来启程来晋，他特派大员梁化之乘他的专用小火车，到风陵渡远迎。不过，当太原青年和各界人士争听周恩来等演说的热烈情景传到他的耳里时，他又不无担心。

此刻，日军第五师团向内长城猛扑而来，八路军的参战至关重要。八路军一一五师主力在林彪、聂荣臻的率领下，冒雨北上，已进至太原北、雁门关南的原平待命。

大同之行，彭德怀一路仔细观察晋北地形：山川雄壮，西南屏障太原，东下直指平津，北出长城，可控制察绥。如此关河，竟不战而退，使友军和社会上本来已经十分严重的恐日病更加弥漫。从云阳总部出发，彭德怀就在考虑八路军如何争取在抗日战场上旗开得胜。这时，他的这个看法更肯定了，而且得到了周恩来的赞同。

阎锡山的会议室壁上，并排挂着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朱德、阎锡山的画像。阎锡山介绍了敌我态势：原设想日军主力坂垣师团进攻的箭头是指向大同，故将大军集结于雁北。不料坂垣在攻占广灵后，直趋灵丘，这时才发现，坂垣系循其年前借口到山西旅行时勘察的路线，进攻平型关，抄击雁门关的后方。加以天镇之溃，大同不得不弃守，阎遂不得不将主力转移至平型关方面，准备与日军一战。

阎锡山拿出了他筹划的方案，布置一个口袋阵，以孙楚之第三十三军（晋绥军）及高桂滋之十七军（西北军）布防于平型关团城口南北线上，以王靖国（晋绥军）之十九军等守雁门关一带阵地，以傅作义指挥两个军展开于繁峙以北，为围歼敌人的主阵地，以陈长捷之预备军（晋绥）在繁峙沙河一带选择地形，构成口袋底。要求八路军与高桂滋军共同防守平型关。

周恩来表示同意阎锡山的计划，同时指出，八路军将发挥特长，运用运动战与游击战的结合，配合友军围歼日军。彭德怀具体提出，以友军坚守平型关正面，八路军一一五师出五台、灵丘、蔚县地区，隐蔽集结于敌前进道路的侧面，从敌侧后夹击进攻平型关之敌；八路军一二〇师则位于晋西北地区，待机侧击进攻雁门关之敌。阎锡山颌首，连表同意。

9月19日，一一五师劳师远至，即奉总部命越五台、出长城，于平型关西之大营镇集结待命。21日，朱德、任弼时、左权率总部抵太原，中共中央军委前方军分会立即举行会议。会议讨论山西战局及八路军的作战计划，大家一致同意彭德怀关于配合友军侧击平型关敌，争取打胜仗，鼓舞士气民心的意见。23日，总部进抵五台之南茹村。当日，朱、彭下令一一五师，选择地形，进入伏击状态，相机出击。

24日，一一五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亲自指挥所部三四三旅之六八八团和六八六团，在平型关外到东河南村间十几里长的沟道东北山地设伏。25日晨，向开进沟道的日军坂垣师团二十一联队主力及辎重部队发起突袭，以勇敢顽强的近战肉搏，歼灭日军1000余人，缴获大批军械物资。

自抗战以来，日军在华北横冲直撞，不可一世，宣扬“皇军不可战胜”，至此，遭到八路军的痛击。英国路透社报道说：“日军以前没有与中国有名的红军作战，现在碰上了，就不容易占便宜了。”

据当时任预备第一军军长的陈长捷回忆，八路军总部派到山西孙楚部联络的高级参谋，曾把一一五师抄袭平型关敌后的情报通知孙楚。望友军从正面出击已进入关隘险区的敌军前锋，收围歼坂垣师团之效。但该守军认为八路军出击敌

后，配合作战围歼敌人是属空想；加以山西军和中央军互不信任，相互观望，并未积极出战。及至八路军创造了辉煌战绩，国民党爱国将士深受鼓舞，亦奋起击敌。阎锡山先对八路军的机动战术将信将疑，未坚决下令配合，这时方大骂放弃团城口的部队“破坏大局”，下令傅作义接替孙楚指挥平型关方面的作战。曾以坚持绥远抗战而闻名的傅作义，得知国民党各派系将领不肯协力，以私愤败坏战机，叹息不已，急令所部驰援平型关，一一五师继续配合袭击敌后，将日军精锐之坂垣师团阻于平型关下。日军第一次记载在华北战场上“第五师团有力之一部”在内长城附近“陷于苦战之中”。

当周恩来、彭德怀在战火燃烧的长城内外奔走之际，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日夜研阅着来自各方的情报，以他那特有的冷静头脑和深邃目光，密切注视着战局的发展。

长征时留在苏区的地方游击队，经过蒋介石政府军的残酷“清剿”，顽强地保存了一部分下来，正在和蒋介石谈判集中改编问题。八路军现在不仅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而且是党籍以实现抗日十大纲领的物质力量。毛泽东深知，具有革命献身精神的红军，久已期待进入抗日战场，面对暴敌，将不惜死战。而无论在国民党政府、军队及一般民众心目中，都认为，抗战就是要在日军进攻下守城池，打硬仗，完全不懂得红军的游击战术；更不用说在国民党当局中，还不足希望在抗日战争中消耗红军实力的人。

9月12日，毛泽东电告彭德怀：“在和国民党谈判中，应着重解释我军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这个基本原则”，红军

则要“坚持依傍山地与不打硬仗的原则”。

早在洛川会议上，由于对红军作战方针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彭德怀和毛泽东曾就红军出师问题个别交谈。彭德怀认为，红军的游击战与运动战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而毛泽东作战方针的基点是游击战，这对于驰骋华夏半壁，长征万里，以劣等装备动辄整团、整师地“吃掉”国民党政府军的红军将领来说，无疑将是一个战略性的转变。因此，毛泽东在 9 月 21 日的电报中特向彭德怀再次强调他的看法：“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只有自己的一种拿手好戏，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毛泽东提醒八路军前方将领：“目前情况与过去国内战争根本不同，不能回想过去的味道，还要在目前照样做。”同时表示：“我完全同意你（按指彭德怀）18 日电中说‘使敌虽深入山西还处在我游击战争的四面包围中’这个观点。请你坚持这个观点，从远处、大处着想，对于个别同志不妥当的观点给予深刻的解释，使战略方针归于一致。”对于以一一五师陈光旅集中、相机歼敌的计划，毛泽东亦表示同意，说：“这种一个旅的暂时集中，当然是可以的。”

9 月 25 日，即平型关战斗打响的当天，毛泽东在给刘少奇并转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的电报中，又一次强调“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

但平型关之战是一次运动战，它虽然没有苏维埃时期红军反围剿战争的规模，却是一场十足的硬仗。在战斗结束后，林彪仔细巡视了战场，后来回忆说：“敌人确实有许多弱点，可为我乘。但敌人确是有战斗力的，也可以说是我们从北伐到苏维埃战斗中，还不曾遇过这样强的敌人。强，是说他们步兵也

有战斗力，能各自为战，虽打败负伤，亦有不肯缴械的，战后只见敌尸骸遍野，却捉不着活的。在和国民党军作战中，敌人只要一打垮，就大批缴枪。但平型关战斗中，我军将敌打垮后，敌人靠拢成一团，拼死顽抗。我方战士还上前喊话：‘缴枪不杀’，结果反遭敌杀伤。敌我伤兵扭在一起，相咬相打，战斗是极为酷烈的……”

八路军在这次战斗中伤亡 600 余人，比起其他军队在战场上的伤亡，这是个小数字。但八路军的指战员，是十年革命战争锤炼出来的红军精华，毛泽东的方针不是要八路军仅以数万血肉之躯，消耗于敌人阵前；而是要做火种，发动千百万民众参加抗日的游击战争。

因此，平型关一仗，曾被认为是违背了毛泽东的战略方针，使老红军受到重大牺牲而遭非议。然而，平型关之捷，给全国带来了华北战场上第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鼓舞了全国的士气民心，打击了亡国论和恐日病，在一直被动应战的抗日战场上，树立了一个主动出击挫敌的范例，证明日本皇军并非“不可战胜”。共产党、八路军的英勇精神和神奇战术，在全国获得崇高的声誉，中外记者、包括国民党中央社的记者都长途跋涉，到五台山偏僻的小村南茹来访问，发出了一篇又一篇赞誉的报道。八路军的平型关首捷，为八路军的深入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恰恰创造了最为有利的条件。

希望出现了

1937年9月29日，当日军坂垣师团在平型关陷于苦战，进